

近

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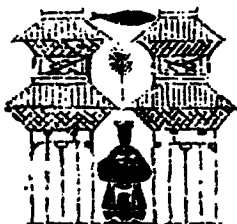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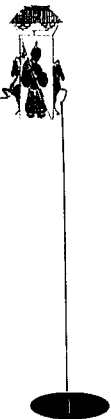
录

宋·朱熹 吕祖谦 编 查洪德 注译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

前言

《近思录》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。它选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 4 人语录 622 条，分类编辑而成，在中国旧时代文人中，影响极大，清人江永说它：“凡义理根源，圣学体用，皆在此编。”“盖自孔曾思孟而后，仅见此书。”因而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必读书。

宋孝宗淳熙二年(1175)，朱熹 46 岁，吕祖谦 39 岁。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，与朱熹会晤。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的著作，深感 4 人之书广大宏博，初学者不易把握，为后学晚进计，他们编订了这本《近思录》。近思者，取孔子《论语·宪问》中“切问而近思”之义，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，由近而及远，下学而上达，不废初阶，循序渐进。按朱熹的表述是：“四子，六经之阶梯；《近思录》，四子之阶梯。”



其实,《近思录》的编订过程并不像人们知道的这么简单。从创始到成书,至少经历了3年以上的时间,中间屡经反复,多次修订。初稿与定稿,相去甚远。淳熙二年会晤之后,次年又曾会晤,这次好像是朱熹至吕祖谦处。会谈的内容,即使不能肯定专为《近思录》,起码包括《近思录》。按笔者的考查,《近思录》创始于淳熙二年(1175),定稿在淳熙五年(1178)之后,根据就是《晦庵集》卷三十三所载朱熹给吕祖谦的3封有关《近思录》的信。按《四库全书总目·近思录》提要之说,这3封信分别写于乙未八月、丙申、戊戌,即淳熙二年、三年、五年。

《近思录》的流传,自初稿成后,即已开始,初以抄本流行。朱熹丙申《与吕伯恭》书中谈到:“此本既往,无以应朋友之求假,但日望印本之出耳。”此后当由吕祖谦负责刊行。在朱熹去世以后,曾学于朱氏之门的叶采,致力于注解《近思录》,积30年之力而成《近思录集解》,于宋理宗淳祐八年成书,十二年,表奏于朝。叶采集解本,便是后人眼中的定本。

此后的700年中,《近思录》一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,元、明、清之大儒,多熟读《近思录》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所言:“宋明诸儒,若何氏基、薛氏瑄、罗氏钦顺,莫不服膺是书。”其实元代诸儒,如金华一派;清代诸儒,如江永、张伯行、尹会一等,又何尝不服膺是书呢?

《近思录》影响之大,首先表现为刻本之多。其最初刻本,当在定稿之前。今见于《读书附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著录的,均非叶采集解本。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与朱熹《近思录序》,又大不相同,今引于下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云:

朱熹、吕祖谦取周、程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六百十九条,取“切问而近思”之义,以教后学。

朱熹《近思录序》云:

相与读周子、程子、张子之书……因共摄取其关于大体



而切于日用者，共六百二十二条。

两者不同有二：一是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言不及张载，也即说《近思录》所取为周敦颐与二程 3 人言论，朱熹序则并张载为 4 人。这一差别不可简单地指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为误。朱熹丙申《与吕伯恭》书中有催促吕祖谦刊印《近思录》的话，说：“横渠诸说，告早补定，即刊为佳。……但日望印本之出耳，千万早留意，幸甚。”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，可知《近思录》初稿不录张载语，并已流传。至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是否初刊本（或抄本），则不得而知。以常理推断，吕氏作为中州文献旧家，居浙江为大族，在朱熹如此催促下，不会不很快刊印。但根据朱熹戊戌《与吕伯恭》书，《近思录》又作了修订。故可推断，《近思录》在定稿之前曾有刊本。再一是条数的差别。则既经反复增删，条数变动是自然的，已不必考究。只是与叶采同时的杨伯岩，也有一个《近思录》注本，其条目与叶本有异。今传《近思录》或作 623 条，多出的一条，在第五卷最后，即录自杨伯岩注本。

明清以来的刊本，多到不可历举。其中有影响的，如明正德十四年汪伟刊本（南监本），明稽古斋刊本，清正谊堂本，吕氏宝浩堂《朱子全书》本等。仅进入 20 世纪到 30 年代这短短的时期中，据我孤陋所知，就有近 10 种刊本。大型丛书如《四库全书》，收注本 3 种，存目 1 种，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、《国学基本丛书》各收 1 种。在国外，如朝鲜等地，也有刊本。明正德间，就曾在朝鲜刊行，其奉训郎集贤校理知制教世子左司经臣金汶跋曰：“我殿下思欲广布是书，顾其旧本间有误字，乃命臣汶雒校，命铸字所模印颁赐。”这自然可以说明，《近思录》流传之广了。

《近思录》影响之大，又表现为注家之多。首先，《近思录》有朱熹自注，不过不是成书，而是在讲学或答问中，对《近思录》所录各条基本上都有解说，这些解说，保存在朱熹的《文集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中，成为程朱后学解说《近思录》的依据。最早的注



本自然是上文谈到的叶采集解本和杨伯岩注解本。叶采集解，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本子，此本曾正式表奏朝廷，叶采本人又曾亲承朱熹之绪论，且积 30 年之功成此一书，用功深矣。这些都是叶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。直到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著《近思录集注》时，仍然“坊间所行者，惟建安叶氏《集解》而已”（茅星来《近思录集注序》），不能不说是影响深远了。宋代又有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所著《近思录发挥》，但其影响远不及何氏《中庸发挥》、《大学发挥》。其书著录见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一及《宋史艺文志补》。元代（或说明人）则有周公恕《近思录分类集注》，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一著录，云：“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，非叶氏本书也。”此书遭到清人江永抨击，说：“近世周公恕，分出细目，移动本文，破碎纠纷，或漏落，或妄增，大失朱吕之意。”（江永《近思录集解凡例》）此书后来几乎失传，今仅有善本存北京图书馆等处，而在明清之间则极为流行。元明时尚有赵顺孙《近思录精义》（《千顷堂书目》）、戴亨《近思录补注》、黄绩《近思录义类》（明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）。清人注本，有影响的有江永《近思录集解》、茅星来《近思录集注》、张伯行《近思录集解》，还有李文炤《近思录集解》（均见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三）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。江永之解，基本上采自朱熹之说，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言：“凡朱子《文集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中其言有相发明者，悉行采入分注。或朱子之说有未备，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，间亦附以己意。引据颇为详洽。盖永邃于经学，究心古义，穿穴于典籍者深，虽以余力为此书，亦具有实证，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。”江永本既出，其流行超过叶本，自成书至 20 世纪 30 年代，仅仅百余年中，刊本不下 10 种。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部备要》收入，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所收也是江本。1994 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诸子百家丛书》，其《近思录》即抽印《四库全书》中江本。江永集解本如此流行，首先是由于其注解准于朱熹，编次又恢复朱熹原貌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江西藩署刻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本，都



在书名上标出“朱子原订”字样,它适应了人们尊崇正统的心理。其次,江永虽是集他人之解,但不蔓不枝,恰切了当,深见功力。其三,是由于它简明而便于阅读。茅星来《近思录集注》、张伯行《近思录集解》也都功力极深,所以也颇为流行。茅星来本文字校勘极精,注释又以详明见长,名物训诂,考订援据,根源分明,尤为适于初学者。张伯行本重在解说疏通,深入而又浅出,义理隐微之处,一经点掇,则明白晓畅。阐释义理,是其所长。两书分别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中。注家如此之多,可以看出《近思录》的影响。

《近思录》影响之大,还表现为续书之多。宋代就有蔡模《近思续录》(姚际恒《好古堂书目》),元代有柳贯《近思录广辑》(见宋濂《浦阳物记》卷下),明代有郭儒《续近思录》、江□□《续近思录》(均见《千顷堂书目》);清代则有汪佑《五子近思录》,施璜为作《五子近思录发明》,江阴何氏有《续近思录》(均见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);郑光明《续近思录》,刘源录《近思续录》,张伯行《广近思录》、《续近思录》(均见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三),尹嘉铨《近思录三编四编》、《近思录辑要》(见《禁书总目》)等。其中以张伯行《续近思录》影响最大,其次为《五子近思录》。有关续书问题,此处不拟详述,仅想借此说明《近思录》影响之大。

《近思录》在旧中国何以能久盛不衰呢?当然最基本、最显见的原因是,它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基本读物、入门读物、概论性读物。这些特性,是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基本的、重要的著作所共有的。避开共性的东西,探寻《近思录》个性特点,则其久盛的原因,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。

第一,总括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,集中体现其精华,为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。周敦颐(濂),二程(洛)、张载(关),生当北宋盛时,上承宋初三先生之学,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,糅合释、道而三教归一,创立了理学,至南宋朱熹(闽),始集大成,建立了完整



的理学体系。周、张、二程的宇宙生成论、万物化生论、人性论，以及处己治人等学说，散存于他们的著作中。初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著作，必将茫然而不知自何而入。正如朱熹《近思录序》所说：“读周子、程子、张子之书，叹其广大宏博，若无津涯，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，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，以为此编。”使“有志于学者”，“诚得此而玩心焉，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”。这是编者的初衷，实际证明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初衷。这一编纂目的之所以能很好实现，首先是这部书确实体现了周、张、二程思想的精要，博中取约，而约中又反映了其思想全貌。其次是它不仅反映了濂（周敦颐）、洛（二程）、关（张载）学，更是闽（朱熹）学的集中体现。《近思录》中的周、张、二程之学，原是朱熹眼中的周、张、二程之学。茅星来《近思录集注·后序》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：“马、郑、贾、孔之说经，譬则百货之所聚也。程、朱诸先生之说经，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。”我们借用这一比喻，那么也可以说，《近思录》中周、张、二程之语，犹如百货。而朱熹的选择与解说，便是对这百货的权度。这就使得《近思录》成了宋代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全面、集中、简明、概括的表述。如果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是一座富丽的宫殿，《近思录》便是足以窥知这一宫殿全貌的门，有了《近思录》，便可“得其门而入”。

第二，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，各章之间，逻辑关系分明，使读者有脉络可寻，弥补了理学著作散焉而难举的缺陷。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，于是不为辞章，只以语录传道。语录随事问答，自难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。朱熹有一段论为学门径的话说：

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皆当读，但须知缓急。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，然《语》、《孟》随事问答，难见要领，惟《大学》是说古人为学之大方，体统都具。玩味此书，知得古人为学所向，读《语》、《孟》便易入。

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这一缺陷,也同样地存在于周、程、张、朱的著作中。《近思录》的编纂,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。为理学建立一个看得见的逻辑体系,可以说是编者编辑此书时刻意追求的目的之一。这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可明确看出。其乙未八月信中说:

《近思录》近令抄作册子,亦自可观。但向时嫌其太高,去却数段(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),今看得似不可无。如颜子论为首章,却非专论道体,自合入于第二卷(作第二段)。又事亲居家事,直在第九卷,亦似太缓,今欲别作一卷,令在出处之前,乃得其序。

戊戌信中说:

《近思录》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,今已上呈,恐未有安,即望见教。即欲移入第六卷者,可否?亦望早垂喻也。

此处所谓“序”,即逻辑顺序,亦即各卷之间甚至一卷之中的逻辑关系。由两信可知,编者对其逻辑关系是多么的认真,简直达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。后世阅读和研究《近思录》的,也深明于此。今存叶采集解本、茅星来集注本卷前小序,都着意阐发各卷之间甚至卷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。更为重要的是,《近思录》中体现的逻辑体系,不仅是此一书的逻辑体系,也是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的逻辑体系。这就使得程朱后学,不能不把这部书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。

第三,它是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。按朱熹的说法是:“四子,六经之阶梯;《近思录》,四子之阶梯。”而前人有直接将《近思录》上接六经的,说“学者能读《近思录》,方可以治经”。《近思录》不仅可以使学者入圣学之门,而且还是一个导人步步达于高深的阶梯;不仅具有一个理学理论的逻辑结构,而且还有一个从易到难、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。请看吕祖谦《近思录序》(或称作题词):

《近思录》既成,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,大抵非始



学者之事。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，后出晚进，于义理之本原，虽未容骤语，苟茫然不识其梗概，则亦何所底止？列之篇端，特使知其名义，有所向望而已。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、日用躬行之实，且有科级。循是而进，自卑升高，自近及远，庶几不失纂集之旨。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，躐等陵节，流于空虚，迄无所依据，则岂所谓“近思”者耶？览者宜详之。

按吕氏之说，《近思录》当从第二卷读起，最后返回来读第一卷，这就是它的“科级”。而到通得第一卷，明于“阴阳变化性命之说”，对于理学，已可谓知其高者远者了。叶采《近思录集解序》也称，此书“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，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，体用兼备，本末殚举”。“盖时有远近，言有详约不同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，推求远且约者，斯可矣。”

尽管从孔孟到二程，他们的原著本身没有也不曾考虑过难易顺序问题，但他们的教学理论与读书理论，却都十分强调循序渐进，学不躐等。《近思录》有“关于大体”者，有“切于日用”者，由下学而至于上达，阶梯分明，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论。这里有两点应该特别指明：其一，他们强调循序渐进，实是强调下学功夫，要求学者就切身日用处下功夫，不废初阶，不陵节以进，不可“厌卑近而骛高远”。所以《近思录》于读书之法、齐家之道、出处之义、处事之方等，谆谆不倦，正是此义。其二，这种对下学功夫的强调，乃是针对言性命之学者空疏之病而发。赵氏《近思录跋》就曾说，学者读《近思录》，“不惑其途路，则千里虽远，行无不至矣”。“不然，徒高远其言，诡异其行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：‘道学云云者’，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以为吕祖谦《近思录序》：“其言著明深切，尤足药连篇牍，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。”就这点说，《近思录》又是一剂疗治道学千年空疏顽症的良药。甚至在今天，对于阔论传统文化的人，仍不失针砭之义。



此外,《近思录》采取类辑的方式,也适应理学家提倡的自我体认的学习方法。程朱治学,反对解说,强调学者的内心体认。如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载:学者问仁,程颐说:“此在诸公自思之,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,体认出来。”又卷十五载程颐语:“说书必非古意,转使人薄。学者须是潜心积虑,优游涵养,使之自得。”《近思录》将同一问题不同人之说,同一人不同时之说,类聚一处,各说或互相发明,或互相补充,或同中有异,或似异而同,便于读者自己“体认”。所以朱熹说:

《近思录》文字,初乍看也是难,有时前面恁地说,后面又不是恁地。这里说得如此,那里又却不如如此。仔细看来看去,却中间有个路脉。推导得四五十条,又却只是一个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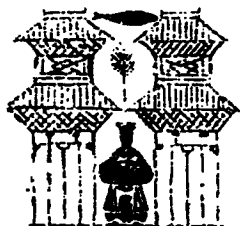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读《近思录》而自我体认的过程。这种注重内心体认的学习方法,是由理学认识论决定的,也适宜于学习理学说。即使今人学习古代文化,也应采取这种方法。这也是《近思录》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。

《近思录》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《近思录》所取之书,如张载《横渠文集》、《论语说》、《孟子说》、《礼记说》均已散佚,《文集》惟存《文集抄》一卷。即使今日尚存的,如《二程遗书》、《二程外书》,《近思录》中所录,有多条不见今本。

这次整理,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,文字校勘,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,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,随校随改,未出校记。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,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。有关义理阐释,尽可能借助朱熹、叶采、茅星来、江永、张伯行等旧解,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。少作辞语注释,更不疏解文意,文、辞之意可于译文中见之。翻译不是字句对译,以明理为准。此本共 623 条,多出的一条,乃前人录自杨伯岩本,即第五卷最后一条。卷六原有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一条,清代张



伯行删去,换成了“今人多不知父母之爱”一条,今从张伯行本,为保持旧貌,将“饿死事极小”一条录入注文。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注于条下,前人注错出处的则改正,今本不见的则于注中指明。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,书后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。所有这些工作,有谬误或不当处,幸望读者教正。



目 录

卷 一	道体·····	(1)
卷 二	为学大要 ·····	(33)
卷 三	格物穷理 ·····	(95)
卷 四	存养·····	(141)
卷 五	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·····	(177)
卷 六	齐家之道·····	(201)
卷 七	出处进退辞受之义·····	(217)
卷 八	治国平天下之道·····	(241)
卷 九	制度·····	(261)
卷 十	处事之方·····	(285)
卷十一	教学之道·····	(317)
卷十二	改过及人心疵病·····	(331)
卷十三	异端之学·····	(345)
卷十四	圣贤气象·····	(359)
附录	·····	(379)
	(一)序跋·····	(379)



- (二)江永集注本辑朱熹论《近思录》…………… (388)
- (三)叶采集解本各卷小序…………… (390)
- (四)茅星来《附说》辑评…………… (392)
- (五)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各本《近思录》提要…………… (393)



卷一 道体

1·1 濂溪先生曰^①：无极而太极^②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；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。^③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^④。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^⑤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^⑥五气顺布^⑦，四时行焉。五行，一阴阳也；阴阳，一太极也；太极，本无极也。^⑧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^⑨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^⑩妙合而凝^⑪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^⑫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^⑬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灵^⑭。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^⑮五性感动而善恶分^⑯，万事出矣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（本注：圣人之道，仁义中正而已）而主静（本注：无欲故静^⑰），立人极焉^⑱。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^⑲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^⑳又曰：“原始反



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”^⑦大哉《易》也，斯其至矣！

——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

注①濂溪先生：即周敦颐。居于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，有濂溪，周敦颐用以名其在庐山之书堂，故学者称濂溪先生。按此条为周敦颐《太极图·易说》全文，又名《太极图说》。此篇反映了周氏的宇宙生成论、万物化生论、人性论。历代学者多有解说，而至今研究者仍认为“文字简约，意思含混”，不易把握。《太极图说》是对《太极图》的解说。

②无极而太极：无极概念源于《老子》，指无形无象的宇宙原始状态。太极：语本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何谓太极，以及太极与无极的关系，前人有不同解说，此处涉及首句文字之异同。按一般认为此句原作“自无极而太极”，则是太极本于无极，无极生太极。无极为无，太极为有，则如老子“有生于无”，无极为世界本源，太极以及阴阳、天地、五行、万物俱为无极派生。朱熹认为此句当做“无极而太极”，则太极本即无极，“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”，太极即是宇宙的本源和中心。无极而又太极者，意谓太极是理，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，无极表示理之无形无迹。朱熹有《太极图说解》。

③几句说：太极能动能静。动生阳，静生阴，阴阳是从太极的动静产生的。

④根：根基。互为其根，是说动和静相互依存。

⑤两仪：指天地。按《周易·系辞上》之说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“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广大配天地。”周敦颐这里将天地之生成看做太极动静结果。

⑥阳变阴合：是说阳气变动，阴气便与之配合。阴阳一变一合，生成水火木金土五行。按《周易·系辞上》云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四象即春夏秋冬四季，八卦即是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。周敦颐则将五行之说引入。五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古人认为是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元素，其说见《尚书·洪范》。

⑦五气：五行之气。按：五行在地为质，在天为气。顺布：流



布。 ⑧一：归一，归本之义。按前几句说太极动静生成阴阳，阴阳变合而成五行。这几句倒过来，说五行根源于阴阳，阴阳根源于太极。 ⑨各一其性：言五行各有其素质和特性。

⑩真：本真。精：精微。真、精，都是指最微妙精粹的东西。二五：二气与五行，即阴阳和水火木金土。 ⑪二句本《周易·系辞上》。乾：《易》卦名，象征天，阳性。坤：卦名，象征地，阴性。

⑫交感：交互感应。二句本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” ⑬秀：指天地阴阳之秀气。 ⑭二句说：有了形体，又有了神智。形生于阴，神发于阳，于是有了心智。

⑮五性感动：五行之性感外物而动。 ⑯无欲故静：语本《老子》：“无欲故静，天下将自定。” ⑰人极：指做人的最高标准。极，准则。

⑱与天地等四句，出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，言《乾》九五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中大人之德。 ⑲六句出《周易·说卦》。按：说卦言圣人之作《易》，“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”。在天为气而分阴阳，在地成形而为刚柔，在人为德性，仁为柔阴，义为刚阳。 ⑳二句出《周易·系辞上》。

译周敦颐说：无极即是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到极处归于静；静生阴，静到极处又回复到动。一动和一静，互为根源。太极动静分出阴阳，形成了天地。阳阴变化配合，而生成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。五行之气流布，推动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运行。五行归一于阴阳；阴阳归一于太极；太极本于无极。五行的生成，各随其气质稟性。无极的本真，阴阳五行之精微，神妙交合而凝聚成形，象征天的乾成为男，象征地的坤形成女。乾坤阴阳二气交相感应，化育生成万物，万物生生不息而变化无穷。其中只有人类，禀赋了天地的秀气而成为万物之灵。形体已经形成了，神智也感发而有了心智，其中的五行之气感于外物而动呈现出了善恶，于是引出了错综纷杂的万事。面对这纷繁的万事善恶，圣人使自己定止于中正仁义（本注：所谓的圣人之道，也就



是守持仁义中正而已),而其心主于“静”(本注:没有欲望所以就静),这样树立起了做人的最高标准。符合这一标准的圣人,就如《周易》上说,其德性与天地相合,其光明与日月等同,其进退之序与四季相符,其奖善惩恶与鬼神所降吉凶同一。君子修养中正仁义所以就吉,小人违背中正仁义所以就凶。故《周易》上说:“建立天的法则,称作阴和阳;建立地的法则,称作刚和柔;建立人的法则,称作仁和义。”又说:“追溯万物的开始,回顾万物的终了,就可以明白死生的道理。”伟大啊!《周易》,这真是至高无尚的了。

1·2 诚无为^①,几善恶^②。德:爱曰仁,宜曰义,理曰礼,通曰智,守曰信。性焉安焉之谓圣^③,复焉执焉之谓贤^④,发微不可见^⑤,充周不可穷之谓神^⑥。——周敦颐《通书·诚几德》

注①诚:周敦颐所谓“诚”,指“无欲故静”的境界。诚无为:意为诚的本性是虚静无为。周敦颐以“诚”为做圣人之最高精神境界,“诚者,圣人之本”(《通书·诚上》)。“诚”之概念,来自《孟子》和《中庸》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:“诚者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”诚为最高的道德规范。《中庸》:“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诚者,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,圣人也。”

②几善恶:语本《周易·系辞下》:“几者,动之微,吉之先见者也。”几即几微,这里指一念之初萌发时。几善恶,意为一念始萌便有善恶。

③性焉安焉:意谓安于诚的本性,也即说不待学问勉强而后得。

④复焉执焉:意谓回复本性守持不失。

⑤发微:发诚之微妙。⑥充周:使诚扩充而周遍。神:指圣人之德神妙而不可知。周敦颐以“诚、神、几”为圣人之德性。《通书·圣章》云:“寂然不动者,诚也;感而遂通者,神也;动而未形,有无之间者,几也。诚精故明,神应故妙,几微故幽。诚、神、几曰圣人。”